

元代货币论文选集



丛书编委

主编 张功平

副主编 韦满昌

编委 (按姓氏笔划为序)

王 彤 韦满昌

张功平 杜承武

程卫红 翟国强

前　　言

1989年6月与1991年3月，继《年号索引》和《辽代货币论文选集》先后出版发行后，内蒙古钱币学会“钱币学、货币金融史丛书”编委会经过近2年的精心编选，兹将《元代货币论文选集》奉献于读者，以便对元代货币进行深入研究时参考。

内蒙古是哺育北方诸游牧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摇篮。我国蒙古族在漠北的兴起和发展壮大，花去了300多年的时间，到13世纪初，于1206年铁木真称成吉思汗，建立了蒙古汗国（又称大朝）。此后，经过几十年南战西征，结束了金、西夏、西辽、南北宋、大理、吐蕃等长期四分五裂的局面，在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手上于1279年完成了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大业，奠定了中国辽阔的疆域，建成了统一全国的元皇朝，正所谓“天下会于一，驿道往来，视为东西州矣”。

元朝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有所成就，它促进了中国各民族以及中外经济文化的交往和进步。值得重视的是，有元一代在中国货币发展史上的成就可以说是开创性的。元朝政府将纸币定为全国唯一的法定货币，建立了最早的不兑现纸币制度，它对后世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影响。元初用金银作纸币的准备金，有效地维持了纸币的币值和长期正常流通。基于此，本选集有关纸币的论文占有一定比重。

蒙古汗国（大朝）时期，元太祖成吉思汗伐金后，铸有汉字“大朝通宝”钱。1271年，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后，其绝大部分时期实行纯粹的纸币流通制度，禁止用银和用钱。只有在武宗海山至大二年（1309年）时（铸至大通宝平钱及八思巴蒙古字大元通宝当十钱）和顺帝妥欢帖睦尔至正十年（1350年）以后（铸至正

通宝及至正之宝钱），才较大规模地铸造了铜钱，实行钱、钞兼而行用的政策。

元代对宗教采取了开放的态度。喇嘛教、道教、基督教和伊斯兰教，同时并存。喇嘛教是佛教之一支，故佛教尤受尊崇。各寺观则铸造供佛之用钱，这些供养钱亦曾在特殊情况下作为正式通货进入流通。

元末，皇室挥霍无度，政治腐败，财政拮据，造成滥发纸币而引起通货膨胀、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。农民起义军为了解决市场通货的不足，并建立农民政权独立的经济体系，以促进商品流通、繁荣市场、恢复经济，取得群众的拥护，曾在短期内自行铸币。

本选集则力图选取有代表性的论文，将上述重要时期的货币经济及货币文化等情况作出持之有故、言之成理的论述。但限于我们的水平和时间，不免有疏漏和缺憾，望读者不吝指教。

中华货币文化之源远流长、丰富多采，可谓举世无双。到了元代，如前所述元朝政府开了将纸币定为全国性的法定货币、建立不兑现纸币制度之先河。它在我国乃至世界货币发展史上是不可磨灭的，占有举足轻重之地位。当今世界，社会公众所持有、使用的通货，基本上是纸币。而且，货币制度、理论、政策日益发展、完善，这些都不无历史借鉴作用。

在研究元代货币经济及货币文化时，本选集如能对读者理清脉络、开阔思路有所助益，从而达到古为今用、推陈出新、丰富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宝库之境界，将是我们很大的快慰！

编 者
1992年9月

目 录

前言	(1)
元代货币制度新探	乔晓金 (1)
对元代货币信用史的初步探索	李 敦 (12)
试论元代货币供给政策	洪用斌 (32)
从“物物”到“纸币”的跳跃	
——对蒙古统治者货币观念转变的分析	陈 强 (46)
元代之钞币制度	
——元代货币论之一	黄君默 (52)
元代信用货币之研究	朱 契 (78)
试论元代的纸钞	匡裕从 (95)
关于元代纸钞的几个问题	郭庠林 (105)
元代发行的纸币及其历史意义	李 干 (114)
简论忽必烈的币制改革与元代钞法的历史地位	穆鸿利 (121)
元钞膨胀贬值之原因	李桂茂 (132)
元代钞法刍议	韦满昌 (138)
元代纸币在西藏地方流通考	张虎婴 (144)
简述元代蒙古草原的货币流通	洪用斌 王世萍 (150)
元代伪钞问题刍议	翟国强 杨德华 (157)
白塔中统元宝交钞考说	卫月望 (167)

- 额济纳旗出土元代纸币 普·那生德力格尔(174)
元代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纸币
-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出土的元钞及票券 李逸友(178)
九江出土元代烧钞库印 卢亭风 王少华(193)
记元代昏烂钞印
- 简谈元代以前古钞的注销 唐石父(195)
元代“昏烂钞印”的补充 赵人俊(198)
无锡市博物馆藏“至元通行宝钞” 冯丽蓉(201)
- 元代之钱币
- 元代货币论之二 黄君毅(205)
元钱考略 杨鲁安(211)
元钱通论
- 兼谈元末起义军政权的铸币 朱 活(224)
元代供养钱考 孙仲汇(242)
谈“大朝通宝”与“大朝金合”钱 龚 渊(252)
成吉思汗病故清水与当地出土的大朝通宝 刘大有(256)
大朝通宝考略 逸 乘(259)
试析“至正之宝”权钞钱 戴仁和(262)
大元国宝铅质雕母样钱 杨成麒(265)
-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 韩儒林(267)
《蒙古字韵》和元代钱币
- 八思巴字释读 陈乃雄(270)
元四体异文钱试释 陈乃雄(276)
蒙文大元通宝背星文钱 薛玉树(280)
- 东胜州故城出土的元钱 石俊贵(282)
昌吉古城出土的蒙古汗国银币研究 陈 戈(285)

新疆博乐发现的察合台汗国

- 金币初步研究 蒋其祥 李有松(333)
辽宁朝阳西涝村发现元代银铤 靳枫毅(348)
元代蒙山岁课银铤的发现和研究 谷 潜(355)
- 关于元代云南的“真趴”“私趴”问题 方 慧(367)
元代的货币流通在数学史中的反映 戴中原(373)

附 录

- 元钞价值的变动 [日] 前田直典 著 姚溯民 译(377)
元代的铜钱 [日] 远藤龟松 著
 博仁、刘兴泰 译 孟和博彦 校(390)
至正钱研究 [日] 谷巧二 著 周丙启 译(403)
元钱拓集 王贵忱(410)
1919年以来部分元代货币论文目录 (416)
元朝帝系表 (428)
元时期形势图 (429)

元代货币制度新探

乔晓金

元代的货币制度是复杂的，在我国货币史上有一些重要的创举，起承前启后的作用。由于后世种种局限和偏见，造成一些讹误和分歧，形成一些学术公案。本文试图对元代货币制度的几个问题进行一些讨论，难免臆断警说，望予批评指正。

一、元代不兑现纸币，是世界上 最早的无限法偿纸本位币

元代是在宋金两朝用钞经验的基础上采用钞票的，忽必烈于中统初年即印造丝钞。以丝为单位，一千两准白银五十两，即白银一两折丝20斤。这种实物券形式的流通券，保留了草原上以物易物的痕迹，与实物挂钩，好处是易于衡量币值。缺点是来回折算，使用不很方便，故又于十月造“中统元宝交钞”，改为以铜钱为单位的纸币。规定一贯等于丝钞一两，白银半两。这种钞票共分九等，最小的单位十文，纸质也不太好。针对这一情况，世祖又造过丝织的银钞和厘钞，但未推行。后来币值下跌，于至元二十四年（1287年）颁行了“至元通行宝钞”，与中统钞并行，每一贯当“中统”钞五贯，以后各帝一直用钞。武宗至大二年（1309年）又颁行了“至大银钞”，每一两又准至元钞五贯，白银一两，黄金一钱。并一度改为钱钞并行，铸了“至大”通宝钱。仁宗即位，又废钱行钞。到顺帝至正十年（1350年）又颁行一种“新钞”，但仍以“中统元宝交钞”为名，只是背书有“至正印造元宝交钞”戳记，也就是“至正交钞”，规定每一贯又准

旧钞五贯。如是元代用钞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，史书上记载有：

“中统四年、立平准库、通利钞法”^①。

“五年设各路平准库，主平物价，使相依准，不至低昂”^②。

“诸路领钞，以金银为本，本至乃钞降”^③。

“纸钞稍有壅滞，出钱收钞。恐民疑惑，随路櫈积元本金银分文不効”^④。

由于有以上记载，人们就认为“元代钞法比其它各朝都要严密”，“设立平准库，买卖金银、以维钞价，有钞本集中现银于国库，有强大的准备金……”^⑤。是否确是这样的呢？很值得研究。

首先说钞币的发行制度。“领钞以金银为本，本至乃钞降”讲得是“诸路”向中央领钞的情况。而由中央直接发行用于军资赏赐等是否也“以金银为本，本至乃钞降”呢？肯定不会。不用说是以金银为本了，就是能做到量入为出也是很不易的，这里不妨让我们看看元代的财政开支情况。

世祖初期战争频繁，有平息阿里不哥叛乱的战争，又对违令不朝的西北诸蕃用兵。1253年出兵安南、1271年攻缅甸、占城、爪哇，至元十一、十八年两次出兵日本。每次出兵少则数万，多则十数万。即使胜利也需犒赏。至元十三年，“置宣慰使于济宁路，掌印交钞供给江南军储”，“四川平，劳赏军士钞二万一千三百三十九锭”。“赏重庆等处从征蒙古汉军钞三万九千九百五十锭”。其次是朝廷每年以巨额的金银钞币赏赐给皇室诸王勋贵，有岁赐、特赐、朝会赏赐、忽里勒台大会赏赐。安西王乞给钞万锭，敕以千锭给之。最多一次“赏钞五十万锭，银九万余两，帛六万匹”^⑥所有这些支出，全是印发宝钞。至元九年（1273年）以前，中统钞的发行每年不超过10万锭。到了至元十一年（1276年）发行额竟增至190万锭。至元十七年（1280年）三月就中建议疏通钞法，说明宝钞已经贬值。这时物重钞轻，“如书省一贯才当往日一百”^⑦，交钞贬值90%。至元十九年

(1282年)忽必烈敕“中书省整治钞法”。以上事例充分说明元诸的发行制度并不完善健全，而是根据皇上需要发行的。

那么是否有充足的保证金呢？元代每次整治钞法的条画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，即改以金银做保证的兑现纸币，但总未能采纳。至元二十三年讨论更钞用钱时，吏部尚书刘宣就曾谈到：“……创造新钞，与旧钞相权，只是改换名目，无金银作本，称提军国支用，不复抑损，三数年后，亦如元宝交钞无异……”^③这就说明元代纸钞早已没有等量金银作保证了。“国朝初，朱张二户以通海运功，上宠之，诏赐钞印，令自行造用”^④。连钞版都赐给了朱清、张宣，听令自印，还谈什么金银保证呢？

平准库的任务又是什么呢？据《续文献通考》记载就是“随路之平准行用库，买卖金银，倒换昏钞”。“各路立平准行用库，贸易金银，每银一两入库，其价至元钞二贯、出库二贯五分……是民之有金银者可赴库换钞；有钞者亦可赴库换金银也。”^⑤如此则平准库只不过是兼做兑换货币的金银买卖店，仅是通过金银买卖起调节维持物价的作用。就这样一个机构也不是能够随意买到金银的，据刘宣谈在阿合马专政时，即“将诸路平准库金银尽数起赴大都……所行皆无本之钞，以至物价腾踊”^⑥。又据《元史》载，成宗把“诸路交钞库所贮金银九十三万六千九百五十两，除留一十九万二百五十两为钞母，余悉运至京师”。又据《元典章》载，当时全国平准行用库共65处，如是则每处仅储金银不足3000两，根本起不到甩卖金银、平抑物价的作用。马可波罗也曾形容过这种行用库，他说：“如果有谁想弄点金银来铸酒杯带钩……也同样可持纸币到造币厂换取金银”^⑦恐怕也就只限于酒杯带钩之类罢了。至元十九年九月曾下令对平准行用库进行理算、诏令说“……买到金银……不见起纳，倚赖权势，将买下金银倒换出库”故要求各库对“倒换金银数目造册清理，说明当时平准行用库已不起作用。真如《元典章》所说，不是痴

利之人……作弊”，就是“官典往往苟延日月开库不行例换”^⑩。所有整治钞法的条画几乎都有“设立平准库”的建议，说明就连这个调节机构也未坚持下去。正象至元二十一年世祖敕令所说“中统宝钞、岁久法弊”。当然平准行用库的办法也弊到了什么程度？《元典章》有一段记载，至元十九年……今市肆行使尽系昏钞。虽有行用钞库，每日止限例换昏钞四百锭，更有不开库之日……”。连换损伤券都换不到，可见买金银更难了。直到元二十四年改行至元钞时，又规定“依中统之初，随路设官库，买卖金银、平准钞法”^⑪。这就说明元代的平准行用库徒具形式，只在元初执行了一阵子。

所以元代纸币“以金银为本”的说法，仅是一句空话，而是纯属以国家政权强迫行使的兑现纸币。这种纸币虽然以‘两’以‘文’等金属币为单位，但并无等价关系，它的价值不受金属的约束，发行额并无什么限制。“这种纸币大量的印造后便流通于大汗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，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使用……”^⑫。元代纸币不予兑现，没有保证金，按照货币史的角度来讲，这正是一种进步性。因为这种不兑现的纸本位币，与现代纸币别无二致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：纸币的产生是人们发现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铸币，仍能完成交易媒介的职能，表明货币充当流通手段时，人们并不计较它本身有多少价值，这就引起本身完全没有价值的纸币来代替它。元代坚持使用纸币，说明已经发现了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，只是起瞬间作用，完全可以用一种符号代替的秘密，所以坚持不兑现的纸本位制度，开始甩掉了金银铜铁等铸币的缺陷，也不受兑现纸币要有保证金的约束，开始在货币符号里任意驰骋。纸币不予兑现，在金代已经有过，当时并未明文规定，只是取消了7年界份，元代则有近百年的纯纸本位币历史，有人认为：“纸币虽则开始于宋，而内容与形制的完成则是金、元间的事，以后很少变化”（贾敬麟教授未刊本《古钞图录序》），这确是深刻的见解。所以从货币史

的角度来讲，应给以元代纸币正确的估价。采用纸本位的不兑现纸币，这正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。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创造出一套管理发行的办法、也未总结出纸币流通的规律。而以纸币发行来解决财政开支，以“点金术”解决“称提军国支用”。总计元代三革其钞，亦未挽救其纸币失败的命运。但我们说失败的不是元代的纸币，而是元代的政治和财政制度，纸币是一种工具，在于如何运用，如果运用得法，当然可以“权物利民”，如果运用失当，就会火上加油，成为一切社会的矛盾的爆发点。元代纸币制度后来传入波斯、印度、日本，这些国家也一度采用过纸币。世界上发行纸币的尝试则迟在17世纪末叶，如美国是在1692年、法国在1716年，元代在这方面比欧洲国家要早400余年。

二、元末的权钞钱是不兑现纸币制度的补充

元代的钞票不断的贬值，进行过三次大的整治，每次整治钞法都有一番争论，每次争论都离不开“子母相权”这个问题。至元二十三年议论更钞，刘宣提出“……宋交钞比铜钱易于奔擎，民甚便之，稍有滞碍即用现钱，尚存古人‘子母相权’之意”⑨。刘的主张就是钱钞并用，“子母相权”。

“子母相权”的提法，最早见于《国语》。东周中叶（约纪元前六世纪）周景王患钱轻拟铸大钱，穆公单旗反对这种做法。他说“古者天灾奖戾（临），于是乎量资币，权轻重，以振救民，民患轻，则为作重币以行之，于是乎有母权子而行，民皆得焉。若不堪重，则多作轻而行之，亦不废重，于是乎有子权母而行，小大利之。今王废轻而作重，民失其资，能无匮乎……”。当时商品交换开始发展，货币量需求增加、货币开始由实物形态进入仿形阶段，客观上要求货币有重量标准。单旗所谓的“轻重”概念有双重性，既有币值的含义，也有货币单位大小的含义。他认为发行货币是为了正确的衡量物品的价值，方便人民的生活，所以必须确定恰当的币值和货币单位的大小。患轻就是人

们感到货币单位的太小了，或是每一个货币单位所代表的价值量少了（购买力低了），这时候就应该发行大的或是价值高的。反之则应该发行小的或是价值低的。并且大小之时要有一定的比率，调节流通，这就是“子母相权”的原意。这里“权”有统驭衡量的意思，也有暂时代替的意思，母权子而行就是母代子而行，子权母而行就是子代母而行。后世把这个概念发展成为本位币和辅助币的关系。如宋代以钱为本位币是母，以纸币辅助代替流通，是子代母而行。

元代的争论，实际是铜钱和纸币的争论。其实元代的纸本位制也是逐步的确立的。开始发行“中统钞”的时候以钱为文，虽未铸钱，但是有钱钞同行的意思。世祖二十四年发行“至元钞”时，就明文规定“至元钞一貫文当中统钞五貫文，子母相权官民通用”^⑩，这已经是明确的以纸权纸了，新钞价高，等于主币，旧钞贬值价低、等于辅币。后来至元又贬值，成宗时不得又“议更钞法”。郑介夫仍主张钱钞并用，他认为，“前宋铜钱与交会并行，以母权子而母益贵，……今国家造钞……而散之民间者甚少，民得之者甚难，无他，轻重失相权之宜也”^⑪。他甚至认为“夫铸钱乃古今不易之法”，郑的建议最终未被采纳。到了顺帝时丞相脱脱及尚书契笃哲建议行至元新钞，明确提出“以钞一貫权铜钱千文，钞为母而钱为子”的主张^⑫。脱脱的概念很明确，就是要“以钞为母、以钱为子”。一些史家认为这种意见简直是奇谈怪论，其实这正是元代货币制度的发展。因为他肯定了依靠政权强制发行纸本位币的可能，把纸币正式当成本位币，以铜钱做为辅币，这实在是货币史上的一大进步，如果搞好财政物价，发行得到控制，是完全可行的；可是在元代末期已很难做到这一点了，于是又开始了一场争论。以祭酒吕思诚为代表认为：“钱钞用法以虚换实……若下民知之，藏其实而弃其虚恐非国之利也”^⑬。吕的主张和郑介夫同仍然是实行铜本位币，以纸代铜而行。顺帝没有采纳吕的意见，最后还是发行了新钞和至正钱，沿用纸本位

币。

元代有一种权钞钱，当时怎样使用，史无明确记载，按照“权钞”即是代钞的意思，即用钱代替钞票，这样与一般的以纸币代替金属币的作法正好相反，人们认为“这是一种特殊的币制”^②。其实这就是一种最早的金属辅币。当时不兑现纸币制度已确立，再行废止很明显是不高明的。至正钞，每贯合铜钱千文、白银一两。那么标明白银五钱的权钞钱，至多用铜二两就可顶五百铜钱和五钱白银、这实际也是减重省铜的办法。我国封建王朝已用过减重办法，如直百五铢、大布黄千，当十当百等钱，但这仅是单纯的减重办法。元代权钞钱的背后还有大额的钞票，使铜钱也符号化，就这一点来说，也是我国货币上的又一创举。在此以前元代的辅币问题一直没有解决，中统钞最小面额十文，至元钞最小面额五文，至大银钞最小面额二厘，无法解决民间柴米油盐酱醋等问题，所以“市井变迁、难以碎贴”，形成“得钞一张扯拽不开，若买物还钞，则不肯多贴，欲尽钞买物，则多无所用”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曾一度发行过小额券“厘钞”，最小面额一文，等于一枚铜钱，甚为方便。后因成本高，易昏烂，倒换难，复命停用。就是五文十文的小额钞票也数量很少、所以茶坊、酒肆、勾栏等地，出现了纸标、竹签、木牌、油写钱数，代以找零。脱脱提出以钱权钞的办法后，元代货币制度才算完善，元代创立了纸本位制度，发展了“子母相权”论，把纸币移植在金属币上，行使了以纸为本位币，以金属币作辅币的制度。人们把元代货币贬值的罪名罪都加在纸币制度上，说是“钞买钞”，一些史书也说脱脱是“欲有建立，以求名于后世”^③却忽略了这种做法在货币史上的进步性。如果说脱脱在货币史上确有建立的话，其名还是应该扬于后世的。

三、元代铜钱诸问题

整个元代通货以钞为主，断续的实行过钞钱并用。见于史载

的武宋铸过至大钱和蒙文大元钱、顺帝铸过至正钱。依此看来钱元似乎甚为简单，但据实物看来还有中统、至元、大德、皇庆，延祐等年号钱，几乎每帝都有年号钱，但均未见于史载，如此看来，元钱似乎又甚为复杂。尤其是元代有世祖和顺帝两个至元年号，到底那种钱属于前至元，那种钱属于后至元，也很难分清。因为元史有卢世荣铸钱一节，人们争相把自己的至元钱说成是前至元铸品。又加元代有庙宇钱，供养钱，香殿钱，妇女头上佩带的春钱，这就使的元钱更复杂化起来。是否是史书确实漏载了呢？要了解元代铸钱的情况，至元钱是个关键，现在就让我们对世祖时的货币政策进行一些分析。

在元代以前，我国使用方孔圆钱已有千余年的历史。世祖建国以后到底要用什么？忽必烈进行过慎重的考虑。早在中统元年，监察御史多尔济巴勒就曾“请铸钱币”。为了此事，世祖曾问过太保刘秉忠。刘说：“钱用于阳，楮用于阴，……今陛下龙兴沙漠……宜用楮币。俾子孙世守之……”^①。世祖深信此言，“遂绝不用钱”。刘言纯属迷信，但也不是随便说的，而是审情度势，揣测迎合忽必烈的思想而编造的，因为蒙古人深受中亚影响，崇尚金销而不重视铜。在中统二年，世祖曾“罢金银铜铁…坑冶所役民夫……还之州县”^②，并禁止民间私自炼铜，“诸出铜之地，民间敢私炼者禁止，”因之元代的产铜量骤减。至元十三年（1276年）灭宋，为了决心用钞，于至元十四年即下令“禁江南行用钱。”至元十五、六年，虽又恢复了山东七宝山、辽阳等地铜矿，但直到至元二十年，铜冶也不过“十有一所”，从事人员亦仅2000余户，开采的方法还是“见设官员自备工本”^③每年征得铜课仅只14602280斤。而北宋初期铜冶达46处，元丰年间产铜达一千四百六十万斤^④，真是相差甚为悬殊。至元十七年正月曾诏“括江淮铜及铜钱铜器”^⑤。为什么叫“括”，就是强迫征收性质。把铜钱铜器征集起来，目的是为了决心用钞，紧接六月就在江浙推行钞法并废行宋钱。江南禁用铜钱，当

然江北早已不用。到至元十九年又用左丞相耿仁言“用钞易铜钱，”令市舶司“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”^⑩。可见世祖十九年以前，铜钱只能运到国外去，国内已绝不用钱。一个政府的政策总有相对的连贯性，绝不应朝令夕改；从以上年份看至元十九年以前是不会铸钱行用的。

认为世祖曾铸钱行用的唯一根据就是卢世荣建议铸至元钱与钞参行。卢世荣是否铸了钱呢？至元二十一年任卢世荣为中书右丞，卢上任后提出“理财整钞九条画。”他确实曾建言：“……钞法虚弊，为今之计莫若……括铜铸至元钱及制綾券，与钞参行，因以所织綾券上之。”^⑪世祖说“便益之事，当速行之。”其实卢世荣所提的办法，“初未行，中外已非议。”结果是“二月拘收天下铜钱，”三月即被御史大夫陈天祥参劾，说他“苛克殊求，为国敛怨，”^⑫世荣当即下狱。世祖又下令“世荣所行，当罢者罢之，当更者更之。”卢世荣的办法非单纯治钞，他的条画包括盐酒专卖、官木造船、官办牧场等种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。甚至还有平抑物价、缩减劳役、设立平准周急库等有利于人民群众的措施。可惜操之过急，触犯了权贵利益，忽必烈只好以他的头来平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。卢世荣理财治钞的悲剧就此结束了，到底是否铸了至元宝钱呢？

卢世荣的办法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旨的，整治钞法只是辅助的办法，封建社会的财政收入主要是赋税课程，只要下令即可改变。而货币却是关系到每家每户的事，比较复杂。而历来整顿钞法都是采取另发新钞，确定新的比价，而后收兑旧币的办法。卢世荣也明确提出“括铜铸至元钱与钞参行，”他的本意就是要发行綾券，改变币值和铜钱并用，废除中统钞。但是织綾券易，铸铜钱繁，所以他只来得及向世祖呈献了綾券式样，并未来得及铸出铜钱样品。如果说已经铸钱颁行，则中统钞一定要废，即使不废也要确定新的比值，但现有资料还未找到这类记载。

另外铸钱要有机构，象资国院，泉货监等亦未闻建立，卢世荣

当政总共4个月，实际工作不过百日，铸钱仅限于计划。按照当时交通条件，边远地区也仅限于见到命令。就连参劾卢世荣的“罪状”内亦未提到铸了钱的事，《新元史》的记载更为具体，说“二十一年中书右丞卢世荣请铸铜钱，言钞法虚弊，宜括铜铸至元钱与钞参行，帝然之，已而不果。”这就是说根本没有结果。

据考证，这个时候（1282年至1284年）马可波罗正在扬州，马的记载是“这个城市人民崇拜偶像，用纸币，臣服大可汗。”^②他也同样没提到用钱的事。

卢世荣于九月问斩后，世祖的钞法虚弊问题仍没有解决，到至元二十三年又讨论“更钞用钱”的问题，吏部尚书刘宣有一段议论“……国朝废钱已久，一旦行之，功费不资，非为远计……”，这也说明元代早已不铸钱了，刘还说“大抵利民权物，其要自不妄用，若欲济邱壑之用，非为铸造敷抑，亦不久自弊矣”^③这次议论似有铸钱可能，但因“桑哥谋立……钱议遂罢”^④，最后还是于至元二十四年发行了新钞“至元通行宝钞”，确定了新的比值“至元钞一貫文准中统钞五貫文”。世祖的钞法虚弊问题就此缓和了，也就没有必要再铸钱了。这一点还可以在顺帝推行钱钞并用的诏书里证明，“……惟我世祖皇帝，建元之初，颁行中统宝钞，以钱为文。虽鼓铸之规未遑，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。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……名曰子母相权，钱实未用……”^⑤。这里交待的已很清楚，顺帝距世祖不过六七十年，想不至对其祖宗成法搞错。《元史》的作者宋濂亦说“元之交钞（中统）宝钞（至元）虽皆以钱为文而钱则弗之铸也”。通过以上分析则世祖一代共35年，根本没有正式铸钱行用。元代除了武宗铸至大钱史有明载外，其它各朝均未记载铸钱的事。但元代不论那朝都有年号钱传世，几乎各帝一无所缺，所以有人认为是史书遗载的原故，其实漏掉一帝一朝是可能的，如果完全漏掉则是不能的。那么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？《新元史·食货》有这样一段